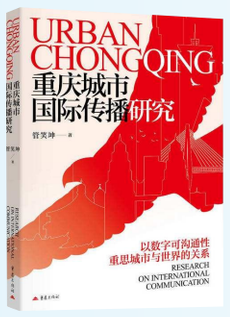
从“被看见”到“被认同”



用沟通联结世界,用好奇打捞乡土。本期读书版推荐两本书写重庆的书籍,观照当下,亦回望来路。《重庆城市国际传播研究》立足现实,探讨数字时代城市如何从“被看见”到“被认同”。《川江野获》则用不曾熄灭的好奇心寻访川江风物,打捞城市远去的市井往事。两部作品,一部向外探寻真诚对话,一部向内挖掘文化根脉,共同追问一座城市该怎样被记录、被传播、被读懂。

——编者

■崔保国

当斯科特·麦奎尔在“亚太可沟通城市研究联盟”首届论坛上提出,数字媒介可以帮助我们“想象一个不同类型的城市,一个沟通的城市”时,他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兼具理论雄心与实践关怀的命题。数字技术之于城市,不应仅仅是提升治理效率的工具,更应成为促进公共对话、增进社会连接、培育文化认同的基础设施。

管笑坤博士所著的《重庆城市国际传播研究》,正是对这一命题的深度回应。他以中国内陆城市重庆为经验场域,以“数字可沟通性”为理论透镜,系统考察城市如何借助数字技术,与全球受众建立真正的“可沟通关系”。这部著作的价值,不仅在于为中国城市国际传播研究贡献了一个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更在于以中国经验与全球城市传播理论展开了一场富有建设性的对话。

本书有一个贯穿始终的鲜明特质:它不是一篇从文献到文献的书斋式推演,而是一部真正从传播一线“长”出来的学术成果。作者长期在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工作,对城市国际传播中每一个环节的痛点、堵点都有切身体会和认识,来自一线的深度参与,使他的研究始终保持可贵的“问题意识”:从实践中遭遇的真实困惑出发,追问理论能够提供怎样的解释与出路。这种“有根的研究”,是当下传播学界最稀缺也最需要的学术品格。

作者在研究中展现的理论建构方式,对传播学的知识生产方式提出了反思。他不是从某个西方理论出发寻找中国的对应现象,而是从中国内陆城市国际传播的真实现状出发,在充分理解既有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建构出能够解释自身问题的分析框架。这是中国传播学研究从“理论引进”走向“理论贡献”所必经的一步。

本书的核心理论贡献,在于将“数字可沟通性”操作化为“可传播—可理解—可协商”三个递进维度。“可传播”回应城市的国际可见性——重庆的国际报道覆盖范围从2015年的160个国家和地区扩展至2025年的189个,覆盖语言从48种增至86种,这是数字技术赋能内陆城市打破地理边界的有力证据。“可理解”关注跨文化语境中的情感共鸣与意义共享,“可协商”则指向多元主体协同的制度生态。三个维度层层递进、环环相扣,任何一维的缺失都可能导致可沟通性的整体失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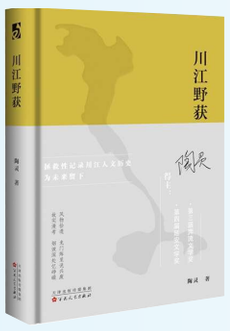
本书最令人印象深刻之处,在于作者对“轨道穿楼”“洪崖洞夜景”等爆款内容背后传播逻辑的冷静审视。当一座城市凭借几个视觉奇观标签成为全球网红时,流量的胜利是否就意味着沟通的成功?作者以“数字可沟通”为透镜,系统揭示了从“被看见”到“被认同”之间的坎坷道路,恰好回应了一线工作者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如何让“网红”真正变为“长红”?如何使流量沉淀为认同?这些问题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温度。

在信息碎片化、算法主导注意力的当下,如何让一座内陆城市在全球舆论场中发出清晰、持续、有辨识度的声音,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时代命题。本书以重庆为样本给出了系统回答,不仅为城市管理者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法论,也为所有关心中国城市国际传播的人们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本文为《重庆城市国际传播研究》序,有删改)

我的“猫”一直活蹦乱跳

——散文集《川江野获》创作札记



■陶灵

小时候,父亲单位有台称重物的磅秤,放在一间大屋子里。这屋子宽敞,有时晚上也用作开会和学习。磅秤秤盘是一块长方形铁板,前后左右可微微摇动,因为它的四角是用珠子托起的。秤脚为四只小轮子,方便移动称物。

有一次,听几个大人“扯闲白”时说,秤盘下的珠子这么小,竟能承受上千斤的东西,如果是普通铁做的话,早被压扁压破了,不知用的什么高级材料。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一心想看看到底是什么神奇材料,某天,趁屋子里没人,我使尽全身力气,搬起秤盘铁板的一角,拿出一颗珠子。随后“哐当”一声,我没力气扳住,手一滑,铁板落了下去。

我拿着珠子不停地转动观察,除了质地像铁外,看不出什么特别之处,瞬间有点泄劲了。我想把珠子放回去,这下麻烦来了,再怎么使劲也搬不起那铁板了。没有了珠子,磅秤肯定用不了,我顿时害怕起来,赶紧把珠子放在缺珠子那角的小轮子边。想来称秤的人必定会看到。

很快,大人们发现磅秤缺了珠子,也不知怎么就肯定是我拿了(父亲单位上又不止我一个细娃儿),直接找我要。我胆怯地回答:“放在磅秤轮子边的。”边说边带路指给大人们看。我傻眼了,地上根本没有珠子。我问其中一个大人:“谢叔叔,你们今晚要学习吗?”谢叔叔回答:“今天星期四,要学习的。”每次开会学习前,他都要扫地做准备,冬天时还会生两个烤火炉。我赶紧问他看见小轮边的珠子没有,谢叔叔摇摇头:“没注意到。”

珠子很可能与垃圾一起被扫走了。我飞快地往江边灰堆子跑,那是集中倾倒垃圾的地方。因为常年从上往下倒,垃圾往下梭滚,堆成了一个扇状缓坡。珠子应该滚到最下面去了,我留意在坡脚寻找,可找了很久也没有收获。我又慢慢顺缓坡往上爬寻,忽然,见它静静地躺在半坡上一个凹凼里——可能是捡垃圾的人踩出的凹痕。我欣喜若狂,松了一口气。

当我拿着珠子气喘吁吁跑回去后,大人们并不相信是在灰堆子上找到的,认为我想要这颗珠子,悄悄放在了某个地方,被追问紧了才不得不拿出来。状告到父亲那里,我理所当然挨了一顿板子,并被训斥道:“你想看珠子,给大人说呀!”

然而,我的好奇心也没因此消减,直到现在。

几年前的一天,我到开州乡村寻找古寨堡遗址。见山坡上李子树的枝条都挂着塑料袋,已经黑旧了,感觉沉甸甸的,里面装有东西。我停车,询问一个正在地里干活的农民。他答:“袋子里装的泥巴,把树枝扳开生长,中间才晒得到太阳,多结果子。”随后,在梁平柚乡采风时,我奇怪,所有柚子树的根部,离地十多厘米的高度都缠着不干胶带,有什么用呢?在与一农户家的儿媳妇交谈时,我问了原因。她说:“蝉虫晚上从土里钻出来,爬上柚子树吃嫩叶尖,缠了不干胶带,非常光滑,它就爬不上去了。”

在某博物馆的展厅里,有一幅解说为“航标灯”的老照片,是一位美国人于1917年在三峡高崖上拍摄的。我从网上找到这张照片后,慢慢放大细看,发现竹竿上吊着一个“人”字形的小木盒,盒上有个小圆孔,可透出光亮。这么一点微弱的灯光,怎能为峡谷中远处的行船引航呢?于是,我询问长江航道管理技术人员,又从长江上游航道史志上查证,得知川江自古不夜行,20世纪50年代中期,航道管理部门才开始在部分航道安装煤油灯,分段试行夜航。显然,这张照片中竹竿上吊的不是航标灯。那么,这灯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我问过很多老船工,他们也不知道。

2016年,我在QQ群里认识了三峡老照片“发烧友”、秭归人乔军,咨询他“航标灯”老照片上到底是什么灯。乔军回答:“‘孤魂灯’,以前川江水急浪高,经常吞噬生命,连尸首都捞不到,民间传说魂魄回不了家,用来‘招魂’的。”后来我在《扬子江上的美国人》一书中也看到类似的照片。再后来,我写了散文《孤魂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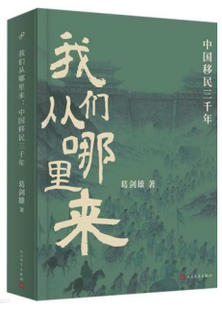
平日里,我好奇的许许多多的事情,就这样一一被弄清楚后,陆陆续续写进了我的文稿,丰富了内容和细节。

这本《川江野获》是我系继《川江博物》《川江广记》后,推出的第三本散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关于这本书的介绍是这样写的:在一段段“龙门阵”中,尘封多年的记忆被徐徐展开,那些被遮蔽的传奇与日常,渐次显露出浓淡不一的时空印迹。

俗话说“好奇害死猫”——传说猫有九条命,怎么都不会死去,而最后偏偏死于自己的好奇心。可我的“好奇猫”一直活蹦乱跳,助力我的写作。

我们都是那个行走的人

——读《我们从哪里来:中国移民三千年》



■袁枚

翻开葛剑雄的著作《我们从哪里来:中国移民三千年》时,扑面而来的是脚步声,不是一个人的脚步,是几千年里无数双脚踩出来的声音——草鞋踩过蜀道,布鞋踏过关东的雪,光脚板碾过西口的黄沙。葛剑雄将这些声音汇聚在一起,让你听到一部无声的、浩荡的历史。说它无声,是因为大多数迁徙者没有留下名字,他们像水渗进土地一样渗进了中国的版图,说它浩荡,是因为三千年间这片土地上的人,从没有停止过行走。

葛剑雄选取的都是历史上有代表性的人口迁移案例,从湖广填四川到闯关东、走西口。他把微观的家庭命运和宏观的国家版图相互交织起来。这是一种心灵考古,探寻那些行走者的心理,他们为什么上路?他们抛弃了什么?他们到达之后又变成什么样?

我们今天所处的位置,大概率不是我们的祖先最初站立的地方。每一个“此处”,都是某个曾经是别人远方的地方。葛剑雄在书中不断提出“我们从哪里来”这个问题,看似问的是地理上的原点,其实是在追问更深的问题:当一个人离开故乡、进入陌生之地时,他身上什么留下了,什么改变了,在代际传递中悄然生长出新的传统又是什么?

“湖广填四川”悲壮之中有家族的离散与重组,“闯关东”“走西口”生存突围中有个体在绝境中的韧性,葛剑雄把这些故事讲得很沉静、有力,不煽情,不夸张,但是你读着读着就会明白: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华民族”,从来就不是静态的概念,它是在一次又一次行走、相遇、融合中慢慢走出的一条路。

书里有一句话:激动是常态,融合是必然。轻描淡写,之所以说激动是常态,是因为每一次大迁徙都伴有动荡、痛苦和不确定——上路的人不知道前方是什么,留下的人不知道归期在何时。融合是必然的,因为在这片土地上不同的方言、不同的风俗、不同的血脉最终会在时间的发酵中变成同一坛酒,这不是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而是三千年历史反复证明过的事实。

葛剑雄是历史学家,但是他的书写却有一种超越学科的广阔。他不满足于告诉你发生了什么,而是希望你去理解这意味着什么。因此移民史在他的笔下不再是单纯的事件记录,而成了关于文明成长与民族凝聚的思考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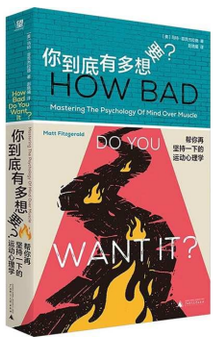
葛剑雄认为,在中华大地上,每一个你我都是漫长迁徙的延续。这句话说得真好,每个人既是行走的终点又是行走的起点,先民们筚路蓝缕走出的路我们还在走,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换了一个方向,但是那种在路上的状态,告别与抵达、失落与获得的循环,一直刻在这个民族的基因里。

因此,这本书不只是写给对历史感兴趣的人的书,更是写给每一个想知道“我是谁”的人,葛剑雄通过三千年的移民史告诉我们:你不是孤立的,你是一条长河里的一滴水,而那条河已经流淌很久很久了。

掩卷之时,想起葛剑雄在书中没有明确提出却无处不在的一个追问,从哪里来固然重要,但是往哪里去同样重要,这两个问题之间隔着无数先民的行走,也隔着我们这一代人的行走。

那未必是终点已至

——读《你到底有多想要?》



■张娓

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决定体育竞技乃至一切极限挑战成败的核心似乎只有两点:一是天赋异禀的生理条件,二是坚韧顽强的意志品质。然而,著名运动科普作家马特·菲茨杰拉德在新书《你到底有多想要?》中,却给出了一个颠覆性的结论:人类在绝境与极限面前,最先喊停的往往不是身体,而是大脑。

市面上从不缺少谈论“坚持”与“成功”的书,《你到底有多想要?》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不仅源于作者兼具“耐力运动员、顶级体育记者与专业教练”的三重特别背景,更在于它为人类的心智韧性搭建了一套兼具科学深度与故事张力的完整框架。

本书是一部逻辑高度严密的“心理生物学心智重塑指南”。全书除引言外共十二章,每章围绕一个心理生物学原则,借助一场精英耐力赛事的真实战役展开叙事,将人在极值挑战中的微观心理机制拆解为可识别、可训练的认知策略。

全书的理论核心,建立在运动科学家萨穆埃尔·马尔科拉提出的“心理生物学模型”之上。传统观念倾向于将长跑或奋斗中的放弃归因于乳酸堆积、糖原耗尽等外周生理极限;但马尔科拉的研究提示:在耐力任务中,意识层面对功率输出的自我调节,主要受认知与动机因素驱动,其中最关键的两个变量是感知努力与潜在动机。

换言之,真正限制表现的不只是肌肉里发生了什么,更是大脑如何评估“继续下去有多难”以及“继续下去值不值得”。大脑本质上是一个极其保守的“安全卫士”。当它感知到的痛苦、恐惧或疲惫达到其设定的安全阈值时,它就会通过发出强烈的劝退信号(如绝望感、自我怀疑)来强行勒令身体停止。因此,天资与体能决定了你的生理上限,但“感知努力”的调控能力,决定了你能多接近这个上限。

你到底有多想要?书名所发出的追问,问的不只是对胜利或外部回报的欲望,更是一个人是否足够想要通过承受艰难来发现“更完整的自己”。驱动人走得最远的力量,往往不是对失败的恐惧,而是对某种内在意义的确认。

相比于一些“鸡汤”励志书,本书展现出了极其鲜明的三个独特性:

以科学认知替代“盲目硬撑”:不少励志书容易把坚持简化为“咬牙硬撑”,仿佛意志力是一种取之不尽的道德资源。菲茨杰拉德明确指出:在耐力情境中,意志力不是凭空生成的蛮力,而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认知策略所调节的技术。通过预先受苦准备、自我对话重构、微观分段等手段,人可以改变大脑对“努力有多难”的评估,从而在同等生理条件下更稳定地调用储备。这比“只要想就能做到”的口号要诚实得多,也更具可操作性。

以血肉故事赋予文学张力:作为资深体育记者,作者没有把书写成枯燥的学术综述,而是把镜头对准了世界冠军们想放弃的瞬间、自我怀疑的瞬间、输得很难看的瞬间。那些站上过巅峰的人,同样会害怕、会想逃跑。这种将心理生物学机制深度嵌入真实赛事叙事的写法,赋予了本书普通励志书难以企及的临场感与说服力。

以内在探索超越“胜负功利”:许多励志书的隐含逻辑是“赢过别人”,但本书指向的不只是对胜利的欲望,而是一种存在性的追问:你是否足够想要看见那个在极限之后仍然选择继续的自己?这种动机框架的转换,让本书摆脱了功利主义的狭窄,也使它能够天然地迁移到体育之外的长期实践中——让大脑先进入“做”的状态,而不是要求它在启动前就消化整座山。

马特·菲茨杰拉德凭借运动员的体悟、记者的眼光与教练的严谨,写出了一本关于“心智韧性”的扎实之作。它告诉我们的不是“你的身体没有极限”,而是在训练合理、身体安全的前提下,你对努力的感知方式,会实质性地影响你能走多远。当大脑再次发出疲惫与放弃的警告时,那未必是终点已至,而可能只是提醒你:该换一种方式与痛苦对话了。当你学会了如何与痛苦共处、如何重塑对努力的感知,你便掌握了通往更高层次自我的钥匙。

《挑战者号的悲歌》:一本沉甸甸的书

■思远

这是一本不太好读的书。

600多页、近50万字的体量,压在手里沉甸甸的。在这个短视频、手机游戏精准捕获用户的时代,让读者划走“三分钟了解挑战者号事故”,而选择阅读这本砖头一样厚的书,不容易。

这又是一本值得读、读后引人深思的书。

挑战者号事故40周年节点,亚当·希金博特姆推出的新作《挑战者号的悲歌》,兼具非虚构文学和调查报道风格,用文字与图片、对话与数据以及翔实的多方解读,将读者紧紧抓住。项目的失控、技术的偏移……作者层层剖析、直指病灶,将事件写得丝丝入扣、悬念迭起、严肃厚重。

1986年的1月28日,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升空73秒后爆炸解体,事故最终导致7名乘组人员全部遇难。观看电视直播的观众,由先前的兴奋、期待,变成惊愕、怀疑、追问。这种情绪如涟漪般荡开,哪怕过去40年,许多人仍然凭借记忆和各种所谓“线索”,不厌其烦地进行信息收集和故事讲述。

本书作者没有用一惊一乍的“标题党”写法放大读者情绪,而是选择了静水深流。他用平静的笔触,将一场事故写得极具史诗感和沉浸感。

挑战者号在发射筹备阶段所做的多次实验,暴露过或大或小诸多问题,工程技术人员主动报告或发出预警。然而,作为项目负责方,NASA选择对事故和预警先照单全收,再放下不表。这种对技术问题的流程性淡化的结果,最终在关键零件O形环上暴露。

挑战者号预定的发射日期是1月下旬,此时的佛罗里达,气温已多次降到零摄氏度以下。尽管工程师们反复论证了O形环会因高温气体而产生侵蚀现象,可能会发生重大灾难,但管理层多次看到关于O形环的风险预警后,不仅没拍板延后发射或下功夫解决问题,反而认真讨论起另一个问题:O形环受损在何种程度上是可以容忍的。

就这样,在安全风险没有排除、技术问题没有解决的前提下,NASA敲定了发射计划。事故发生后,他们没有第一时间公开事故原因,反而拉出著名科学家费曼来“背书”。忍无可忍的费曼最终在一次发布会上曝出O形环的问题,将NASA庞大而顽固的官僚体系,彻底曝光在世人面前。

挑战者号的悲歌,很难用一句话或一个原因来归纳。当一个极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再将“安全”置于最高优先级,而一味追求速度;当过度的承诺和宣传,让航天飞机发射背负太多技术之外的复杂因素,悲剧,就不再是一个密封橡胶圈的问题,而是必然。

由此,一些思考也会在掩卷后冒出。付出的生命值得铭记,回荡的悲歌也应引以为戒。人类对太空的探索,不会因为挑战者号的悲剧而止步,“因为山就在那里”。

近悦远来 书香重庆
电子书 有声书 扫码即可 阅读、收听

据《重庆日报》

城市管理服务热线:12319 邮政投递电话:48612196 法律顾问:重庆永登律师事务所 印刷:重庆华数印务有限公司 审读:一二版金方霞 三四版刘琦 校对:一二版杨静 三四版周铉